学术专论

新词汇、新世界：清末民初“女界”一词探析

秦　方

[摘要] 本文以晚清出现的新词汇“女界”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女性在国家民族话语、男女性别关系和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等脉络互动中形成的身份建构和认同。“女界”可由两条线索进行展开：一方面，对女界的界定可视为自晚清出现的新女性运用自己的文字、出版和言论资源优势，主动地以否定“男界”（此时期另一新名词）之形式，建构起一个以单一生理性别为基础、具有普遍姊妹情谊的理想世界，试图在传统中国女性以家庭角色为身份认同方式之外另立选择。另一方面，“女界”的形成亦受到晚清以来自西方引介入中国的“群治”思想影响。在这一框架中，国家民族被想象为由不同“群”或者“界”——如政界、军界、商界、绅界或者学界等——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女界试图以“界”的身份，与上述各界平权并立，共同参与到对国家民族的建构中来。但是，这一美愿却又遭到诸如妓界之挑战。女界不顾前之所言的那种普遍姊妹情谊，坚决与妓界划清界限，强调二界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本质之别。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扞格之中，女界之大同理想终成幻想。

[关键词] 清末民初　女界　男界　群治　妓界
[中图分类号] K2S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4）－04－0089－11

清末民初大约是近代有关女性新思想、新形象宣传最为猛烈的时期。不仅诸如罗兰夫人、批茶夫人这样的西方女性被译介入中国社会，而且像花木兰、孟母等中国传统女性亦被改写。[①] 如果将之称为一场有关女性谱系书写或女性形象再造的文化运动，其结果之一便是中国女性在传统家族制度下承担的为女、为妻和为母的角色，受到质疑、争论和再定义，而像“孝女”、“贤妇”、“良母”这样体现传统性别规范角色的词汇，亦无法满足这场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和挑战。于是，在这一时期，很多有关中国女性的新名词被创造出来——如女权、女同胞、女国民、国民（之）母等等，用来形容或界定这些新现象或新意境。本文所关注的“女界”一词，便可视为在此历史脉络下衍生之产物。

目前学界对清末民初新名词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大部分论著都集中在政治、经济和中

[收稿日期] 2013－06－20
[作者简介] 秦方（1980－），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 100048；Vanessa_ qinfang@ hotmail. com
[基金项目] 2013 年度北京市教委面上资助项目（0251353037001082）及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2S045）阶段成果。

① 有关中西女性形象在近代的引介与改造，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45－219 页；Joan Judge, “Expanding the Feminine/National Imaginary: 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7 年第 15 期，第 1—33 页。

外交流方面。相较而言，对女性新名词的研究并不多见。[①] 黄兴涛就曾指出，“关于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新的性别名词的关系，目前学界重视不够也研究不足”。[②] 这种学术失衡，一方面是女性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等主流领域隔膜已久，[③]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更为普遍的女性史研究层面上——而非仅限于中国女性史研究领域，以词汇或命名为切入点探讨女性相关议题所面临的挑战。Tani Barlow 在其对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中指出，对女性新名词的探讨，其实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它不仅使我们深入到某一历史时期具体的物质环境中，而且还可反思女性命名这一过程如何成为历史之建构而非自然之形成。[④] 受此研究方法的影响，本文拟以清末民初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为背景，分析女界蕴含的有关女性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的历史化过程。

以“女界”一词为例，它象征着在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话语、男女性别关系和传统精英文化等三重脉络互动中，中国女性形成一种动态的、矛盾的有关自我的认知和定位。一方面，启蒙女性以报刊、女学、社团等为媒介，主动建构起一个以单一性别为基础、具有普遍姊妹情谊的理想世界，这一理想世界试图改变儒家伦理中男女两性关系，并为中国女性在传统家庭角色之外另设选择，但这种普遍姊妹情谊却遭到女界内部等级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挑战；另一方面，女界的形成也受到晚清以来兴起的合群思想影响。在这一阐释框架中，国家民族被想象为由不同“群”或者“界”——如政界、军界、商界、绅界或者学界等——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女界试图以“界”之身份，与上述各界平权并立，共同参与到对国家民族的建构中。但是，这一美愿却又遭到妓界的挑战。最终，女界不得不放弃自我宣称的姊妹情谊，主动且坚决地与妓界划清界限，强调二界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本质之别。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扞格中，女界之大同理想终成幻想。

一、在教化与文明之间：“女界”初现

在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中，“女”、“界”二字渊源有自，但在 20 世纪以前，这二字很少连为一词。虽然有关中国女性议题的论述，自 19 世纪中期便开始经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男性文人之笔见诸报章，且在 1898 年戊戌维新时期，亦有伴随改良政治思潮出版的女性刊物《女学报》，但是，直至 20 世纪初期，“女界”一词才开始崭露头角。据笔者所见，“女界”在 1903 年首见于另外一份《女学报》。该刊物由陈撷芬首创于 1899 年，不久便停办。1902 年 5 月 8 日，陈撷芬以《续出女报》为名，以接续 1899 年之《女学报》，并借父亲陈范《苏报》之网络销售。[⑤]

---

① 目前，笔者可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5 期；黄湘金《“英雌”的陷落：关于沈佩贞的历史与文学形象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 年第 5 期；Leon Antonio Rocha, “Xing: 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rn China,” *Gender and History*, Vol. 22 No. 3 (2010), pp. 603—628; [日] 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姚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年；李奇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郑永福、吕美颐《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4 期；牟正蕴《解构“妇女”：旧词新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翟本瑞《中国人“性”观初探》，《思与言》1995 年第 3 期；Tani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253—289 等。

②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第 175 页，注释 1。

③ Mechthild Leutner, “Women's, Gender and Mainstream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Problem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echthild Leutner and Nicola Spakowski 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t, 2005, pp. 57—85.

④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

⑤ 夏晓虹《晚清两份 <女学报> 的前世今生》，《现代中文学刊》2012 年第 1 期，第 25—33 页。

1903 年 2 月 27 日起，《续出女报》改名为《女学报》，原为“新闻”的栏目改名为“女界近史”，多收录有关中外女权、女学和废缠足等新闻，并一直持续至 1903 年 11 月该刊发行最后一期。① 在此，笔者拟以 1903 年首次出现的“女界近史”栏目为例，具体分析哪些人物、何种新闻可被纳入，以何种面貌呈献给读者大众，以揭示该词首登历史舞台之内涵与语境。

1903 年 2 月 27 日这一期《女学报》的“女界近史”栏目包含三个部分：“上海女学汇志”列 5 条对上海各学校的报导；“各省女学汇志”记录北京、杭州、苏州、广东各地女学的消息；而“中外女界汇志”则收入 17 则有关中外女性的新闻。② 三部分一共 26 则新闻，内容相当丰富，但大致看来，有三个方面较为突出。

首先，在这些新闻中，几乎所有涉及的女性议题——如放足、办女学、男女平权、女性独立等——都与自 19 世纪晚近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启蒙话语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编者以“近史”二字而非当时更为普遍使用的“近事”二字为栏目名称，似乎也在回应着同时期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新史学”观念，即以一种单线性进化的启蒙史观为指导，书写有关国家民族（而非王朝）的当下（而非陈迹）历史。③ 在这一思想脉络中，中国女性的“问题”不仅是这一性别群体的问题，亦是整个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表现。唯有女性问题得到解决，整个国家才可能进阶文明之列。也正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位前往美国留学的薛锦琴女士在其采访中有“中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之一，皆有国民之责任，皆当尽国民之责任，其不知尽责任者，皆是辱国体之人”这样符合“近史”模式的言谈。④ 也就是说，当“女界”初兴时，它被赋予了一种未来朝向、以国家民族为阐释框架、以文明为最终目标的内涵。

但是，在此意图下，却潜藏着以一股以男权为中心、以中国儒家性别规范为标尺来界定女界的暗流。这些消息中的女性或许站在时代的前沿，她们出国留学、撰写史书、谋求自立、宣扬女权，甚至有英女皇“以国为夫”，但是，编者却有意无意地以她们在传统中为妻、为女的角色进行界定，这其实是延续甚至强化了传统儒家思想对女性教化之责。如“名臣有女”这则新闻讲述李鸿章女儿会说多国外语、善舞，颇具新女性之姿，但是，编者似乎将所有趋新因素都归到其位高权重的父亲名上，这位女儿甚至连名字都未留下，只被称为“李文忠公之少女公子”。而在“女士美举”中，编者强调，三位日本女性在天津设立日本蒙学堂，以“内助之余暇，自当教习之任”。⑤

在“女界近史”栏目中，编者还尤为凸显官方权威在女性启蒙过程中的角色。如“选择教习”中清政府外务部派汪大燮赴日，调查留日女学生状况，以为将来女学教习储备力量；“改装定议”中，兴宁知县下令改革妇女银钏装饰之陋俗。而清政府最高权威慈禧太后在同一栏目中竟然出现两次。一是在“京城女学堂”条中，慈禧心念中国女学之不振，“乃将平日所览之女报，谕令大公主等各阅一分”，并有设立女学堂之意。⑥ 二是在“宫中赏雪”条中，慈禧想要赏雪，便不准宫人扫去积雪，还命人取冰筋煮茶，“亦一韵事也”。⑦ 乍看之下，慈禧似乎与女权思想颇不相容，毕竟慈禧象征的帝制皇权与女权背后的国家民族主义有着难以协调的对立关系，尤

---

①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 1 册，《女报·女学报》，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1071—1078 页。

② “女界近史”，《女学报》1903 年第 1 期，第 17—30 页。

③ 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④ 《记薛女士二则》，《女学报》1903 年第 1 期，第 23 页。

⑤ 《女士美举》，《女学报》1903 年第 1 期，第 27 页。

⑥ 《京师女学堂》，《女学报》1903 年第 1 期，第 18 页。

⑦ 《宫中赏雪》，《女学报》1903 年第 1 期，第 20 页。

其是在20世纪初期强烈的反满思潮背景中。[①] 但是，诉求帝制下的官方权威和资源以推动女性启蒙，恰恰是中国女权运动萌发的重要特点。早在1898年《女学报》时期，女报创办者们便经常表现出对慈禧过度的尊崇，如编者报道慈禧拟往天津一事，在文末评论，“我中国皇太后如是之尊，今日驾言出游，诚古今所罕闻，亦众人所不及料。由是观之，将来中国风气之大开，未始非皇太后今日此举开之也，闻之不觉狂喜”。[②] 相较而言，1903年“女界近史”中已少见这种“闻之不觉狂喜”之夸张心态，但编者仍想借助官方权威宣扬女权的想法却并无二致，这从编者在“京城女学堂”中强调太后阅览《女学报》这一细节便可窥一斑。贵如太后，仍需要以《女学报》为启蒙。

可以说，在“女界”最初被使用时，它呈现出一种颇为混杂的状态，既有自19世纪晚近以来启蒙知识分子所宣扬和实践的进步、文明话语，亦有中国儒家性别教化机制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后者，或许编者诚挚地赞誉女界之发达，但在字里行间，不管是家庭里实在的丈夫或者父亲，还是具有隐喻象征的官方权力，男性权威始终挥之不去，成为女性自我认同的隐性标杆。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女界”初现的这种复杂性和碎片感，可能是因为它被用于栏目名称、必须汇集各种新闻所致，也可能是因为它首次出现，还未被很好界定，有时它还会与诸如女子世界、女子社会、妇女社会、妇女界、女学界甚至女子等词混用。因此，我们也要在合理分析和过度阐释之间保持警醒。以1903年《女学报》的“女界近史”为始，在其后几十年中，“女界”一词频繁出现，如期刊名[③]、小说名[④]、女性社团名[⑤]以及大量文章题目和内容中。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大概是1903年金天翮付梓出版的《女界钟》一书，而金本人亦被称为“我中国女界之卢骚”。[⑥] 因此，称“女界”为近代女性史的重要词汇之一，并不为过。

二、“女界”与近代两性关系之转变

从历史角度来看，很多新词语的出现，其后多伴随着一个试图稳定该词内涵和范畴的过程，使之成为一个不言即可自明的概念。但是，这个过程往往事与愿违，它时刻充满着不稳定性，其概念的边界也会随着社会物质或思想的变化以及词语使用者本身不同的诉求而进行调整。“女界”一词便是如此。在其使用过程中，“女界”初兴时两个主要指向——以国家民族为依据的自我赋权和以传统性别规范为潜在标准的自我定位——均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说，这些变化也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所普遍面临的挑战。以下分述之。

“女界”一词的使用，首先反映出晚清以来“女”字内涵及男女两性关系的变化。“女”字在中国传统经典论述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女性家庭角色中的一种，即未出嫁的年

---

① 与《女学报》联系最为密切的《苏报》，即此一时期反满思想最为明显的报纸之一。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7—57页。

② 《太后出游》，《女学报》1898年第3期，第3页。

③ 如1905年佛山出版的《女界灯学报》、1907年出版于日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

④ 如吕侠人：《惨女界》，商务印书馆，1908年；南浦蕙珠女士《最近女界现形记》，新新小说社，1909年，1910年；新阳蹉跎子：《最新女界鬼蜮记》，小说进步社，1909年；青浦陆士谔云翔甫《女界风流史》，五月大声小说社，1911年。

⑤ 如张雄西设立“女界自立会”，以“拯救女界困苦，使女界人人能自立”为宗旨。张雄西女士《创立女界自立会之规则》，《云南》1906年第1期，第87—90页。还有1907年安徽女士胡晓秋决定成立安徽女界保存路矿会，《女界保路会订定会章》，《广益丛报》1908年第162期，第5—6页。

⑥ 《林女士宗素女界钟叙》，《江苏》1903年第5期，第132页。有关《女界钟》的研究，见Louise Edwards，“Chin Sung-ts'en's *A Tocsin for Women*: The Dextrous Merger of Radic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Feminism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4年第2期。

轻女儿，经常与妇（已婚女性）、母等同置使用。据 Tani Barlow 研究，至少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并没有像日后以性别来界定的“女”的概念，而只有为女、为妻、为母这样的家庭角色。① 二是“女”与“男”所形成一对互补、互生之词，② 并且在中国阶序格局之中，男女既有同为“人”之平等地位，亦有“有别”之上下区分。③

时至近代，儒家伦理规范中的这种关系性身份开始松动、受到挑战甚至被推翻，逐渐形成 John Fitzgerald 所谓的“类别性身份”（categorical identity），即在平等的分类体系下，强调某个类别的所有成员均被赋予此类别的某种特质。④ 因此，原先男女两性关系中所蕴含的互补特质和上下之别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兴于清末的男女平权论是挑战儒家伦理中男女上下之别的重要基础。须藤瑞代对“女权”一词的研究颇为精彩。她指出，“整个清末民初，女权概念一直保持与人权的连动性。女权主张的基础，不是在女性是女性之前提下，而是在女性是‘人’的观念上。”⑤ 在时人看来，这恰恰是男女能够且应该平权的重要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男”、“女”作为平等的类别开始被纳入反思甚至实践的范围。激进者如何震等人，提倡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婚姻、家庭制度，男女绝对平等由此成为其无政府社会构想中的一部分。⑥

其次，晚清“二万万妇女”话语使女性成为一个在国家民族框架之下存在的集体性“问题”，预示了日后男女互生互补关系的改变。“二万万妇女”论述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先后将中国女性“问题化”所使用的策略之一，其特点是多以否定论述的方式，强调这二万万人口之无用和累赘，以此合理化启蒙女性的必要性。如早在 1876 年，《申报》就曾刊文指出，“天下男女之数，大略相当，半为男而半为女。若不有教无类，则十人只作五人之用，岂不有负天造生人之意乎?”⑦ 至 19 世纪末期，在甲午战败、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当中国四万万人口被视为从臣民/天下到国民/国家转变的重要象征符号时，⑧ “二万万妇女”亦出现在这样的政治想象体中。如当时权倾一时的大吏张之洞，也用这一理论来论证废缠足的合法性，“吾不惟伤此中华二万万妇女，废为闲民僇民也，吾甚惧中华四万万之种族，从此嵬琐疲薾以至于澌灭也。”⑨

对“女界”而言，“二万万妇女”之论述，意义重大。它凸显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感。尽管这二万万女性多以否定之面貌出现在文明进化或国富民强的话语中，但是它表明，至少就数量而言，这是一股既具颠覆性又具创造性（如果启蒙得当的话）的群体力量。而且，这种整体感使女性的“问题”转化为一种无差别的存在，即像缠足、女学不兴、女子不事生产等等缺陷，是“二万万妇女”共同具有的问题，这样，其背后的国家、族群、社会阶层、家庭背景、地域甚或是年龄、代际差别，可以被轻易地一笔抹去。但是，“女界”与“二万万妇女”虽有内

---

① Tani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pp. 255—261.

② 鲍家麟《阴阳学说与妇女地位》，《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稻香出版社，1999 年，第 37—54 页。

③ 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学生书局，2000 年，第 1—72 页。

④ John Fitzgerald, “Equality, Modernity, and Gender i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Doris Croissant, Catherine Yeh, and Joshua S. Mostow eds., *Performing “Nation”: Gender Politics in Literature, Theatre, and the Visual Arts of China and Japan*, 1880—1940, Brill, 2008, pp. 37—38.

⑤ 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第 203 页。

⑥ 有关无政府主义、何震及其女性观，见 Peter Zarrow, “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4 (Nov. 1988), pp. 796—813; 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2006 年第 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11—350 页。

⑦ 《论女学》，《申报》，1876 年 3 月 30 日，第 1 版。

⑧ 杨瑞松《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象》，《东亚观念史集刊》2012 年第 2 期，第 283—336 页。

⑨ 张之洞《不缠足会章程叙》，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9 年，第 771 册，第 17 卷，第 10 页。

容上之延续，却有实质上之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女界”强调这一时期精英女性试图自我言说并由此建构起现代身份的主动性，即一群从传统闺阁文化中孕育、演变而来的女性，借教育、写作、出版、演说和结社等方式，试图建构新的两性关系和普遍姊妹情谊来寻求女界定位。

就新的两性观而论，“男界”一词的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据笔者目前所见，“男界”一词出现略晚于“女界”。如在1905年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一位名为蒋凤梧的女士在其公开演讲中使用“男界”一词。蒋女士指出，女界“今与男界平等，四万万同胞，女居其半，抵制美货，女界自当一律共表同情、不用美货”。[①] 在1907年创刊的《新女界杂志》上，主笔炼石亦在发刊词中指出，“国于地球之上，无论疆域之大小，人口之多寡，其女界恒居全国民数之半，此常例也。使其女界黑暗，则虽男界开明，亦只得谓半开化国，而况女界黑暗者，其男界必无独能开明之理”。[②]

但是，这种两界平等却逐渐演变为——或者说并行于——两界对立，女界往往通过批判、否定男界来获得自我认同。纵观时论对女界的描述，诸如“沉沉”、“旧”、“黑暗”、“地狱”、“危险”、“凄惨”等词汇频频出现，整个女界被刻画为一个堕落的、黑暗的、毫无变化的世界。对中国女性这种软弱和病态的刻画，其实早在19世纪中期便已出现在传教士和男性知识分子的文字里，尤其是后者在描述中国女性之痛苦时，其用词之惨烈、细节之压抑，尤甚于传教士。但当他们在“问题化”女性时，多是沿袭了刘人鹏所谓“内圣外王”的说话主体，强调知识分子在道德或政治地位上都要成为中心，[③] 他们激情澎湃地批判女性之无知或者憧憬将来女性启蒙之美景，其目的“与其说是解放妇女，不如说是强化男权”，很少有人会将矛头指向自己。[④]

但是，以“女界”为名，这种女性问题化的指向和说话主体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女界书写中，男界被刻画为女界黑暗之始作俑者，是女界堕落和无知的根源所在。如1907年，当金匮一位名为许玉成的女士在发表演说时，她提到一位姊妹曾来问她：我在娘家是一个千金小姐，嫁了读书人，少年公子，博学多才，后来自己又成为举人太太、翰林太太，所以也并没有觉得自己不尊贵。许玉成很是感慨，认为男界对女界的压迫早已进入骨髓而无法自知，“我想我们这女界中，受毒竟受到如此的深重，他们男界的牢笼手段，竟把我们女界牢笼到如此的坚固，弄到我们女界的人，做了奴隶，做了器具，做了玩意儿，连性命都寄在人家手里，他还不知道，他还在那里兴兴得意说是可尊可贵的哩！”[⑤] 诸如此种男界压迫女界、因此女界必奋起夺权的言论，在当时女性期刊上并不少见。

由此可见，男界之于女界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女界中掌握书写权和发言权的女性能够重新塑造她们自己的过去，使之凝固为一个千年来毫无变化的“黑暗”女界，并将男性视为女性受害化的根源所在。女界的这种书写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传教士和男性书写者“问题化”女性的一贯语调，继续强调女性的痛苦和愚昧，但是，女界却得以成为一个思考、发声的主体，自觉强化问题的根源，将矛头直接指向普遍意义上的男性或者男权，由此固化了两界的对立关系，改变了原本两性间互补互生之阶序格局。

在两性关系之外，女界自我界定的另一个重要策略便是外向言说，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姊妹情谊。如果我们将女界书写与传统女性文体（如诗词、弹词等）进行对比，便可看出，传统女性文体总是或明或暗地隐藏着一种女性对于闺阁文学创作的孤芳自赏，即使是以诗词、艺术、

---

① 《汇录各埠女士筹拒美禁华工约》，《申报》，1905年7月19日，第2版。

② 炼石《发刊词》，《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第1期，第1页。

③ 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第71—72页。

④ 高彦颐《把“传统”翻译成“现代”：<女界钟>与中国现代性》，王政、陈燕《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6页。

⑤ 《金匮许玉成女士对于女界第一次演说稿》，《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第5期，第34—36页。

书信等为纽带形成女性社群，也多是侧重社群内部成员之间的交相往来。① 这种向内的对话形式，其实正是前近代精英女性享有文化和社会地位特权的重要表现。

时至近代的女界书写，很多女性主动打破原先那种内敛的心理、文化和语言模式，在文中多运用“我们自己姊妹们”②、“我同胞诸姊妹”③ 等词汇，以一种“亲和的呼告式语法……以同性相亲的话语”④，以一个共同的敌人“男界”，以一段共有的黑暗过去和屈从历史，来建立起一个以“女”为普世标准、强调普遍姊妹情谊的同质化女性世界。就此而言，“女界”虽然形成于晚清救亡图存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但是它却意图建立起一种超越历史具体性的图景。

可是，这样一个充满普遍姊妹情谊的世界，远非大同，它其实制造并掩盖了新的权力等级关系。“我读书明理之女学界者，以我全国女子计之，乃极少数之凤毛麟角。他人弗学而吾独然，夫岂天之宠厚？盖亦责任所寄在是矣。数千年之积习，数万万同胞之沉睡，胥赖今日稍明公理、稍知物竞之少数人以铲除之、扶济之，其责任顾不重哉?”⑤ 以“极少数之凤毛麟角”对比“数万万同胞之沉睡”，女界的形成恰是以确立内部启蒙与被启蒙的等级关系为基础。⑥ 这些“极少数之凤毛麟角”的女性，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并由此认为自己有权力和有能力“代表”女界发声，且有责任启蒙这数万万沉睡之同胞。这种“代表政治”正是近代以来当类别性身份（如“女”这个类别）开始形成时具有的特色，即在某个类别中，一些具有优势的个体认为自己代表整个类别的利益，他/她们不仅有责任促使该类别中每个个体都认识到这一类别的利益，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类别发声。⑦

女界的第三个重要面向便是处理与西方的关系——那个处在以文明为标杆的金字塔最上方的他者。具体就女界而言，相较于这些先觉女性将女界之过去归罪于男界之压迫，她们清晰地以进化论为标准，将中国女界之将来投射于欧美女界。“今试统观全世界诸国，其女界之程度，彼此各殊，而权利之强弱，亦不相等。然但就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论之，则近世女权之最发达者，当以北美合众诸州为最；女权之最不发达者，则以吾中国为最。”⑧ 而日本女界，亦在认真吸取了欧美女界之经验后，跻身文明之列。“当维新以前，他国内女界，除了未曾缠足算是好的，其余黑暗情形，较之中国，还甚几倍呢。他进步极速的原故，皆由于数十年前，一般人士，游学欧美，观其女界开明的景况，与社会上一派文明的现象，回头来，又想想本国女界，才恍然大悟，知道女界万不可无学，女学是与国家有绝大关系的。”⑨

其实，欧美女界之“发达”完全是一个历史书写的结果。自 19 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为强

---

① 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麦田出版社，2003 年，第 23—25 页；Ellen Widmer, “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0, No. 2, 1989, pp. 1—43.

② 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 年第 2 期，第 9 页。

③ 秋瑾《发刊辞》，《中国女报》1907 年第 2 期，第 2 页。

④ 罗秀美《从闺阁女诗人到公共启蒙者：以近代女性报刊中的论说文为主要视域》，《兴大中文学报》2007 年第 22 期，第 31 页。王绯也讨论到同样的问题，见王绯《20 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第 71—74 页。

⑤ 季威《告读书明理之女子》，《神州女报》1912 年第 1 期，第 1 页。

⑥ 罗秀美《从闺阁女诗人到公共启蒙者》，第 6—31 页；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社会：清末民初上海“传统派”文人与闺秀作家的转型现象》，中研院文哲所，2010 年，第 171—201 页；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308—328 页。

⑦ John Fitzgerald, “Equality, Modernity, and Gender in Chinese Nationalism,” p. 46。

⑧ 炼石《女权平议》，《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⑨ 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 年第 3 期，第 17 页。

调中国妇女的可挽救性，经常以类比的方式，指出西方女性也经历了一个从愚昧到启蒙的过程。① 但是，当中国女界借用这种已经形成的进步形象时，她们对于其间的历史往往忽略不计或者只是轻描淡写，而更多强调这种进步的经验是可以藉由双方都存在同质性的性别基础而跨越国家界限进行移植、传递。“自欧化东渐，奔腾澎湃，涌人权天赋、男女平等之潮而而至后，我女界始一扫向日之阴霾毒障，而渐进于人类应享应历之区域，遂一时女校林立，女学大兴，蓬蓬勃勃，生气顿增。”② 而且，这种传递按照进步史观来论，只会越来越好，最后以超越起点而告终，“吾中国二十世纪后之女界，为超越欧美、龙飞凤舞一绝大异彩之时代。”③

三、“合群”书写下的女界与国家民族主义

如果上述男女两界主要是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形成的关系性结构，那么女界和各界的并立便是以国家民族主义为纽带形成的另外一种关系。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晚清自西方引进的“合群”观念。受此理念的影响，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被想象为由各“界”所组成的一个大的有机体，包括政界、绅界、商界、学界、兵界等。在此脉络中，女界以“界”为名，与其他各界相提并论，并以参加社会运动的方式，谋求在国家中之平等地位。但是，女界这种借助国家民族主义自我赋权的方式，却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当争取自我权益和服务国家这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女界轻易地被贬斥、扭曲甚至丑化；二是妓界也试图像女界那样，援引和实践各界平等原则，跻身国家之列。但由于闺阁与青楼长久以来纠结不清，女界这个强调普遍姊妹情谊的社群非但不乐见其成，反而率先表示与妓界划清界限。正是闺阁与青楼之前世，决定女界与妓界之今生。可见，当女界进入社会现实政治时，其所面临的复杂境遇丝毫不亚于在文本里被书写的女界。

所谓“合群”，究其本质而言，强调的是人与人的结合、认同方式。19 世纪末期的合群概念首先由严复提出。他以天演论翻译为契机，强调为保证社会这个有机体适者生存，唯一途径便是合众人之力，求整体生存。④ 而梁启超无疑是晚清“合群”思想之集大成者。根据张灏的研究，梁启超“群”的观念有三个层次，即整合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和政治共同体问题，以区别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仁”学，更加强调“从儒家道德社会的文化理想，转向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共同体观念”。⑤ 而在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及 1900 年义和团被镇压后，合群思想更是深入人心。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不断落败于列强的根源就在于国人只是关心家庭或者家族，没有形成对于国家民族的公德。其结果是，中国像一盘散沙，无法合群，真正将国人的力量全部贡献于国家。⑥ 知识分子的提倡以及国家民族危机的加剧，使得合群逐渐被自然化为强国保种的必然途径。

正是在合群观念的影响下，学界、商界、军界、政界、女界等登上历史舞台。如当时新闻报道中会经常出现各界并列参加某某活动的用法。以 1907 年在上海举办的安徽旅沪恳亲会为例，

---

① 如发表在《京话报》上的《泰西妇女近世史》，按编年史体例，描述了 1801—1848 年西方女性发展情况。张玉法、李又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第 193—209 页。

② 社英《女子宜注重国文论》，《神州女报》1913 年第 2 期，第 11 页。

③ 楚南女子《中国女子之前途》，《女学报》1903 年第 4 期，第 2 页。

④ Wang Fan-shen, “Evolving Prescription for Social Lif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From *Qunxue* to Society,” in 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 Zarrow eds.,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M. E. Sharpe, 1997.

⑤ Hao Chang, *Liang Ch' i-ch' 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Rainbow Bridge Book Co. 1972 [1971], pp. 95—100. 引述文字见第 100 页。

⑥ Wang Fan-shen, “Evolving Prescription for Social Lif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p. 258—278.

“廿二日下午一时，安徽旅沪学会在颐园举行恳亲大会，仕界、学界、绅界、商界、女界各同乡及来宾到会者共千余人”。[1] 除女界之外，其他各“界”均以一些具有共同职业、经历或选择的群体为中心，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折射出晚清以来社会分工细化、新兴群体自我意识的加强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合群在国家民族话语下之有效性，各界均积极主动介入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并将其忠诚的目标指向国家和民族，以合理化自身的存在。[2] 可以说，这些“界”正是合群理念的实际体现。

但是，女界的尴尬之处在于，女界虽以“界”为名，但“女”既非职业、也非选择，且在清末民初的环境中基本上没有变化的可能。学生毕业后若成为军人或商人，尚有从学界到军界、商界之转移，但这种跨界对女界似乎行不通，“女”多被时人甚至女性自己视为一种自然不变的生理属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女界在以国家民族主义自我赋权的过程中表现出尤为复杂的面貌，即如何在政治化属性和自然化属性之间获得平衡。当女性以女界为单位、参与社会或政治运动、获取国民资格时，似乎没有人质疑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当女界开始诉求自身权益时，其身为“女”的自然化属性便成为社会舆论污名化女界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一点在1912年民国肇始、女界争取平等参政权的过程中最为明显。

这年，中华民国成立，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未如约明确女性平等政治权利。于是，很多女界人物，纷纷直言，甚至付诸暴力，来谴责政府的失信行为。其中最激进者，莫过于沈佩贞这位“女界之伟人”。[3] 在一次提倡妇女参政权的会议上，沈佩贞发表演说，“去岁革命时，女子已组织北伐队而促中华民国之成立，是今日之共和一子，亦出代价以购之，并非男子一方面独构成之者也。去岁革命时，既未尝以我等为女子而摈于革命同志之外，岂今日共和告成，我等女子即不能享受共和之幸福耶？故我等今日如不能达参政之目的，急宜有一种手段以对待男子。手段维何？即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4]

这种将参政权的议题转化为一种性交换的方式，显然使得很多人不满。不久，一位名为息影庐的作者便发表一篇游戏文章，指出，“彼男子者既受抵制，势必铤而走险，尽趋于嫖。然则计惟有率天下之闺秀与妓界，互相联络，若不达到女界参政之目的，凡遇旧嫖客，停止十年不与同栖宿，若遇新娇客，十年不与交，一言如是，则男子之计穷，有不拈香跪道而泣求女子参政者乎？”[5]

息影庐将女界与妓界相提并论并非毫无根源。事实上，女界与妓界的复杂关系，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20世纪初期的现实中，都是有迹可循的。自17、18世纪以来，闺秀和娼妓——日后女界和妓界的主要成员——一直被认为是在服务于同一个男性群体，这些男性，在家中为夫为父为子，但是在社会交往中，却也完全享受娼妓为他们带来的文学、娱乐和性服务。[6] 而到了20世纪初期，当女界以“国民一分子”这样的身份来合理化她们对于国家的贡献时，妓界亦采取同样的策略，将自己定位于“国民一分子”，以参与社会、促进国族建设为己任。如1907年在苏州妓界为争取利权的招股传单中，其发起人沈翠琴、刘金珠便指出，“凡我姊妹，亦宜固结团体，不可放弃权利，谁非国民，谁无热忱，为今之计，惟有各尽心力，踊跃认股”。[7] 此后在1908年苏州、徽州赈济活动乃至1912年的国民捐运动、国货运动中，妓界都以组织社团、发表

---

① 《安徽旅沪学会恳亲会纪盛》，《申报》，1907年6月5日，第19版。

② 章清 《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③ 《女界之伟人》，《申报》，1912年1月11日，第2张第3版。

④ 《女界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纪事》，《申报》，1912年9月25日，第3版。

⑤ 息影庐 《闻沈女士演说感言》，《申报》，1912年10月23日，第10版。

⑥ Dorothy Ko, “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Bound Foot: A History of the Courtesan’s Aura,”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4—100.

⑦ 《苏州妓界招股会传单》，《申报》1907年11月23日，第1张第4版。

声明、积极捐款等方式踊跃参加。①

应该说，在 20 世纪初期的环境中，不管按照女界自我界定的哪个标准——强调男女同人的自然属性、以“女”为基础的姊妹情谊，甚至是按照各界对于国家的贡献——女界和妓界并行是完全有理可据的。但是，这是女界所无法接受的。早在前近代时期，很多生活在闺阁中的良家妇女，便利用她们在写作、结集和出版方面的文化资源优势，将妓女排除在她们的文学和社交圈外。② 而到了近代，这一传统亦继承下来。女界依然坚定地与妓界区别开来。比如几乎当时所有女学，其入学标准之一便是只收身家清白的女性，而娼妓、女艺人之流，一律不收。这无疑将那些具有道德威胁性的娼妓排斥于这些现代性的教育资源之外。偶尔有娼妓试图越界，伪装成良家妇女进入女学学习或者自己创办娼妓学校，最终也是落得被驱逐出校或者学校关闭的下场。1906 年，当时上海妓女李泳等人感慨“乐籍之沉沦，谋教育之普及”，决定创办改俗半日学堂，专收妓女为学生，半日上学，半日谋生。③ 但是，女界显然对这种教育越界不能接受。于是，当时上海所有女学校长联名发表声明，刊登在《申报》上，指出“女学尤重德育，今半日读书半日为妓，试问廉耻何在，道德何存？……妓女既入学堂，不得谓之曰非学生，既学生矣，而妓也如故。是并妓女学生两名词而一之。始则误认妓女为学生，继且误认学生为妓女，其害何堪？设想学界幼稚，明眼者，能有几人？即苦为分明，乌得执途人而语之，影响于女学界者尤巨”。④ 最终，女界那个既想成为平等的国民一分子、又提倡普世的姊妹情谊的高贵理想被轧压得粉碎，女界与妓界终归殊途。

结论

纵观 20 世纪初期“女界”形成之过程，有一点相当明确，“女界”一直通过不断的否定来界定自己的主体和内涵。女界不是男界，女界不是妓界或花界，女界亦不是军界、商界或政界。这种主体性建构的方式，尽管可以暂时自然化一个新词汇，但是，它却使其主体性一直处在充满张力和变化的状态之中，正如戴锦华和孟悦所指出的那样，“她们命名了自己，感受到自己，但未能确立自己或阐释自己，她们陷入了以‘我’、‘你’、‘他’为标志的‘一样’的象喻性主体关系，或者，她们心知不一样但没有自己的话语，她无法为这‘不一样’的东西命名，她甚至找不到这样的词汇，或许，在她找到、创造出这样的语汇、概念乃至学说之前，她自身已又复淹没在他人的及‘与他人一样’的话语洪流中间。”⑤ 也正是在如此的命名匮乏中，“女界”之界处于一种不断调整和强化的过程中——既有有意为之，亦有不得已为之。在两性关系、启蒙与被启蒙的等级权力以及社会等级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女界”或许是一个意图包含全体女性的新概念，但是它却无法成为一个容纳全体女性的新世界。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年。

[2]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① 如《妓界发起募赈（苏州）》，《申报》1908 年 7 月 27 日，第 2 张第 4 版《南京国民捐总事务所函》，《申报》1912 年 6 月 12 日，第 7 版《妓界维持国货》，《申报》1912 年 9 月 4 日，第 7 版。

② Kang-I Sun Chang, “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 in Theodore Hu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37—258.

③《纪妓女半日学堂》，《申报》，1906 年 5 月 30 日，第 17 版。

④《各女学校长致江苏总学会函（为改俗半日女学事）》，《申报》，1906 年 6 月 9 日，第 10 版。

⑤ 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2—33 页。

[3] [日] 须藤瑞代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姚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4] 牟正蕴 《解构"妇女"：旧词新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5] Tani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章清 《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

[7] Wang Fan-shen, "Evolving Prescription for Social Lif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From *Qunxue* to Society," in 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 Zarrow eds.,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 – 1920, M. E. Sharpe, 1997。

[8] 戴锦华、孟悦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 Nanxiu Qian, "The Mother Nü Xuebao versus the Daughter Nü Xuebao: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1898 and 1902 Women Reformers," in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rill, 2008。

[10] 刘人鹏 《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学生书局，2000 年。

[11] Kang – I Sun Chang, "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 in Theodore Hu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黄敏兰 《梁启超<新史学>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13] 杨瑞松 《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象》，《东亚观念史集刊》2012 年第 2 期。

[14] 罗秀美 《从闺阁女诗人到公共启蒙者：以近代女性报刊中的论说文为主要视域》，《兴大中文学报》2007 年第 22 期。

[15] 王绯 《20 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16] John Fitzgerald, "Equality, Modernity, and Gender i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Doris Croissant, Catherine Yeh, and Joshua S. Mostow eds., *Performing "Nation": Gender Politics in Literature, Theatre, and the Visual Arts of China and Japan*, 1880 – 194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17] 高彦颐 《把"传统"翻译成"现代"：<女界钟>与中国现代性》，载王政、陈燕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8] 张玉法、李又宁编 《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A New Word! A New World?
The Analysis of "Women's World"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QIN F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Vanessa_ qinfang@hotmail. com)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lternative subjective forma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s with an emphasis on one neologism "women's world" (nujie). When women's world first appeared around 1902, it witnessed a narrowing process of its definition from a loosely established community that admitted anyone, whether men or women, with progressive concerns about women's rights, to a strictly confined world for women and women only. As a consequence, "men's world" (nanjie) was produced specifically as the antonym of women's world. Meanwhi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n grouping in modern China, women's world also qualified Chinese women as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state building process, in parallel with other "worlds" in the society. However, when women 's world became too radical and pursued women's rights beyond the nationalist limit, it was immediately mocked and distorted as the naturalized ally of "prostitutes' world" (jijie). Women 's' world was probably a word for all, but not a world for all.